

另一个 高尔基

[俄罗斯] 帕维尔·巴辛斯基 著
余一中 王加兴 译

М. Горький

译林出版社



第 1 章

对卡希林家族的诅咒



“老妖婆，看你生的这群野兽！……”

“不，你不喜欢他，你不可怜这个孤儿！……”

“我自己就当了一辈子的孤儿！……”

“我给人家欺负成那个样子，恐怕连上帝看见了都会掉泪！……”

——马·高尔基，《童年》

蘇子卿

1

| “有过那个男孩吗？”

下诺夫哥罗德的贵族街上有一座苦难圣徒瓦尔瓦拉教堂，教堂的出生登记簿上有这样一段记载：“阿列克谢出生于 1868 年 3 月 16 日，受洗于 22 日；其父母，彼尔姆省的市民马克西姆·萨瓦季耶维奇·彼什科夫及其合法妻室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皆系东正教徒。为其做洗礼圣事的有神甫亚历山大·拉耶夫，以及辅祭德米特里·列梅佐夫，执事费奥多尔·谢利茨基和圣堂工友米哈伊尔·沃兹涅先斯基。”

这是一个怪异的家庭。阿廖沙^①的教父和教母也颇为怪异，阿廖沙后来没有与其中的任何人保持联系。可无论是他的外祖父，还是外祖母——他跟他们一起一直生活到少年时期——都是笃信上帝的人（如果中篇小说《童年》内容属实）。

他的父亲马克西姆·萨瓦季耶维奇·彼什科夫和祖父萨瓦季也都是怪人，后者脾气暴烈，在尼古拉一世时代他已从士兵晋升为军官，却因“粗暴对待下属”而被革职，发配到西伯利亚。他对待自己的儿子马克西姆也绝不心慈手软，以至于儿子数次离家出走。有一次在树林里父亲还让一群狗去追捕他，就像放狗追咬兔子那样。还有一次，父亲把他打得惨不忍睹，邻里们硬是把小男孩抢了出来。

结果，马克西姆的教育和培养是由教父——彼尔姆的一名木匠承担的，他在木匠家里学会了手艺。可不知是小男孩在那里过得不开心，还是流浪者的天性又开始占据上风，他也离开了教父，领着一帮盲人穿梭于集市；到了下诺夫哥罗德之后，就开始在科尔钦轮船公司做木工。其时，他

① 阿廖沙：阿列克谢的爱称。

已是一个性格活泼、心地善良的英俊小伙儿，并赢得了美人儿瓦尔瓦拉的芳心。

马克西姆·彼什科夫和瓦尔瓦拉·卡希林娜的婚事只有新娘的母亲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卡希林娜一人同意（这桩婚事也是由她促成的）。按照当时坊间的说法，他们是“自作主张”结的婚。瓦西里·卡希林对此感到愤怒不已。他虽说没有咒骂“孩子们”，但也不让他们跟自己一块儿住，这种情形一直保持到外孙降临人世。只是到了瓦尔瓦拉临产的时候，他才让他们住进他家的厢房。他认命了……

然而随着小男孩的降生，卡希林家族便开始不断遭受厄运。不过，正像在此种情形下所常见的那样，命运之神起先向他们露出了淡淡的最后一笑。可以说，这是最后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马克西姆·彼什科夫不仅是一个天才的家具蒙面工，而且还具有艺术禀赋，而这一点几乎就是红木家具制作工所必备的条件。红木家具制作工与粗木工有所不同，他们用贵重木材生产家具，并饰以青铜、玳瑁、珠母、做工艺品用的石板，并且还要完成上漆、抛光和着色等工序。他们生产的是具有品位的家具。

除此之外（这一点也让瓦西里·卡希林不能不喜欢），马克西姆·萨瓦季耶维奇放弃了流浪生活，在下诺夫哥罗德安家落户，并且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物。后来科尔钦轮船公司任命他为事务所主任，还派他去阿斯特拉罕，准备迎接亚历山大二世的大驾光临，并为这一盛事修建了一座凯旋门，而在此之前，马克西姆·萨瓦季耶维奇·彼什科夫已经做过好几回下诺夫哥罗德法院的陪审员。本来嘛，如果他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人家也不会让他去当事务所主任的。

在阿斯特拉罕，厄运就降临到了彼什科夫家族的马克西姆和瓦尔瓦拉两人身上，而且还殃及到了整个卡希林家族。1871年7月（也有资料显示是在1872年），三岁的阿列克谢得了霍乱，并传染给了父亲。小男孩治愈了，而照顾他的父亲却病逝了。他差一点儿就等到他二儿子出世，瓦尔瓦拉在他的遗体旁提前分娩了，为了纪念他便给二儿子取名为马克西姆。老马克西姆葬在了阿斯特拉罕。小马克西姆死在了返回下诺夫哥罗德途

中的轮船上,安息在萨拉托夫的土地里。

瓦尔瓦拉回到了父亲的家里,她的兄弟们为了一部分遗产而发生了争执,他们的妹妹在丈夫去世后本来是有权分得这笔遗产的。外祖父卡希林只好和儿子们分了家。卡希林的家业就这样开始衰败了。

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所造成的最后结果是,过了一段时期,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坛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名字。可对阿廖沙·彼什科夫来说,他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受到了心灵的重创——不久更演化为一场宗教悲剧。高尔基的心路历程便是这样开始的。

事实上不存在科学地描述马克西姆·高尔基(阿廖沙·彼什科夫)早期生平的相关资料。再者说,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顽皮孩子,一个相继失去双亲的孤儿,一桩令人生疑的婚姻所生的孩子:父亲是来自外地彼尔姆的一名工匠,母亲是一个小市民女子——她的父亲原先是有钱的染坊主,后来却破了产。有谁会去注意这个人的言谈举止呢?更不用说去记录下来。虽说他不是个普通的男孩,也不像别的男孩,但毕竟只不过是这个小男孩而已,一个名叫阿廖沙·彼什科夫的小男孩。

不过,还是有几份与阿列克谢·彼什科夫出生相关的文献保存了下来。这些文献刊登在《高尔基及其时代》一书中,该书作者伊里亚·亚历山德罗维奇·格鲁兹杰夫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散文家、批评家、文学史家,“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团体成员,米·米·左琴科、弗·维·伊凡诺夫、维·亚·卡维林、列·纳·伦茨、康·亚·费定、尼·尼·尼基京、伊·格·波隆斯卡娅、米·列·斯洛尼姆斯基^①等人都是这一团体的成员。最后一位在20世纪20年代决定研究高尔基生平,因高尔基在索伦托期间想方设法保护了谢拉皮翁的成员们。但后来斯洛尼姆斯基却另有

^① 米·米·左琴科(1895—1958),弗·维·伊凡诺夫(1895—1963),维·亚·卡维林(1902—1989),列·纳·伦茨(1901—1924),康·亚·费定(1892—1977),尼·尼·尼基京(1895—1963),伊·格·波隆斯卡娅(1890—1969),米·列·斯洛尼姆斯基(1897—1972):皆为俄罗斯作家。

打算,便将此事交给了格鲁兹杰夫。格鲁兹杰夫以严谨的态度和学者的睿智完成了这项工作。

格鲁兹杰夫和热衷于地方志研究的一些专家找到了与高尔基的出生和童年相关的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视为有充分科学依据的证明材料。至于其他方面,传记作家们就只好依据高尔基的各种回忆资料了。这些回忆散见于高尔基文学活动早期所撰写的简要自传和20世纪20至30年代与格鲁兹杰夫的通信(在他不失礼貌的一再追问下,高尔基以不满和嘲讽的态度作了回答,不过答复得很详细),以及高尔基的主要“自传”——小说《童年》中。关于高尔基的童年以及当时他所接触的人物,可以从作家的中短篇小说中(包括晚期的)“探知”一二。但其可信度又如何呢?

高尔基及其亲属的出身,他们(亲属)在不同年代里的社会地位,以及生卒、婚姻等情况在教堂的出生登记簿上,省税务局的单据和其他文件中都得到真实的反映。不过,格鲁兹杰夫把这些文件作为附件放在书的最后,并不是偶然的。似乎他把它们稍微“隐藏”了一下。

在附件里,一向言辞谨慎的传记作家却“无意中说漏了嘴”:是的,某些资料“与《童年》的素材是不一样的”。高尔基文学创作中的《童年》和他生活中的童年并不是一码事儿。

似乎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童年》如同自传三部曲的另外两部(《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一样,都是文学作品。其中的事实自然是经过创作加工的。伊·阿·布宁^①的《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伊·谢·什梅廖夫^②的《上帝的夏天》,或者亚·伊·库普林^③的《士官生》也没有被认为是符合科学的作家传记。在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除了作者的想象成分外,还必须考虑到时代语境,即这些作品写于何时。

《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上帝的夏天》和《士官生》都写于侨居国外期间,当时的俄罗斯在这几位作者的想象中是一幅被血光“所映照”的革

① 伊·阿·布宁(1870—1953):俄罗斯作家。1920年侨居国外。193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伊·谢·什梅廖夫(1873—1950):俄罗斯作家。1922年侨居国外。

③ 亚·伊·库普林(1870—1938):俄罗斯作家。1917年移居国外,1937年返回苏联。

命景象。对内战灾难的回忆势必影响到他们的理智和情感。温习童年的记忆是从这些噩梦中得以解救的一种办法。可以说,这是一种独特的心理“疗法”。

《童年》虽然也写于侨居国外期间,但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高尔基积极参加了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1907)。革命失败后,他被迫离开了祖国,因为他在俄罗斯被认为是政治犯。即使皇帝在1913年为纪念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周年而宣布政治赦免之后,回到俄罗斯的高尔基还是因小说《母亲》而被调查和审讯。小说《童年》是这位俄罗斯政治移民于1912至1913年在意大利的卡普里岛创作的。

高尔基写道:

每当我回忆起荒唐的俄罗斯生活中那些铅一样沉重的丑事时,我就会时常扪心自问:这些到底还值得去说吗?我每次都坚信不移地对自己回答说——值得;因为这是难以抹去的可耻的事实真相,它至今还没有绝迹。对这种真相必须加以彻底了解,以便把它从记忆中,从内心里,从我们那不光彩的艰辛生活中彻底抹去。

这并不是孩童般的幼稚想法。

促使我提笔描写这些丑事的还有另一个较为正面的原因。虽然它们是令人痛恨的,压在我们的心头,残忍地蹂躏着许多美好的心灵,然而俄罗斯人依旧表现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足以抗拒并战胜它们。

说出这些话,提出这些想法的已不是那个孤儿和“上帝的使徒”^①阿列克谢,而是作家和革命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当时他看到革命所带来的种种后果而感到义愤填膺,一方面他归咎于俄罗斯人的“奴性”,另一方面也对民族的蓬勃朝气及其未来寄予了希望。

① 上帝的使徒:即流浪汉。

2 | 象征主义作家论《童年》

有一个事实令人感到惊讶。20 世纪初期的象征主义评论界(勃洛克、吉皮乌斯、菲洛索福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在总体上对《童年》评价甚高。不过有趣的是,在象征主义作家中也有人对此部小说作过负面评价(几乎是唯一的一次),此人就是费奥多尔·索洛古勃。而且这还是有关这部小说的最初评论。

在《作家日记》(1914 年第 1 期)杂志上,索洛古勃写道:“高尔基回国时,跟他当初离去时没什么变化。他是一位擅用斧头的天才,——正如人们在评价涅克拉索夫时所说的那样。他在用文字凿刻形象,如同埃里贾^①用大理石雕刻作品。<……>在阅读过程中,你会感到懊丧不已。不禁会想起托尔斯泰那温馨的童年。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如此不幸和苦难的童年。每篇小品^②中都有打架、斗殴和鞭打。通篇充斥着莫名其妙的暴虐行径。我们看不出,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致使人们去做出各种残暴行为。”

我们可以把它与亚历山大·勃洛克的兴奋的评论加以比较。他于 1916 年在给帕·谢·苏霍京的书信中写道:“您读一读高尔基的《童年》——而不用去看他填写的各种问卷调查表和政论文章等……他笔下的外祖母写得真棒!”

1917 年 7 月他给彼·伯·司徒卢威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到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俄罗斯文化联盟的创建人中没有高尔基的名字,为此他感到忿

① 斯·德·埃里贾(1876—1959):俄罗斯雕塑家。

② 《俄罗斯言论报》从 1913 年 8 月末至 1914 年 1 月末曾分期刊登了这篇小说。索洛古勃将这些部分称为“小品”。

忿不平：“……任何人都会说，在俄罗斯文化史上，《忏悔》和《童年》的作者的名字比第四届杜马主席的名字更为响亮。”

我们还可以把索洛古勃的评论意见与他的象征主义作家阵营的真正战友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一篇文章加以比较。该文发表于1915年的《俄罗斯言论报》（即最先刊登《童年》的那家报纸），标题是《非神圣的罗斯（高尔基的宗教）》。梅列日科夫斯基诘问并回答道：

俄罗斯何去何从？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们一直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他们仿佛是一座座永久的路标，给俄罗斯指明了道路。托尔斯泰是最后一座路标。后无来者，因此俄罗斯似乎已经走投无路了。托尔斯泰之后就没人了——不过高尔基或许是一个。〈……〉

的确如此，高尔基所相信的，不是神圣的、谦卑的、受奴役的俄罗斯，而是有罪过的，举行暴动、争取解放的俄罗斯。他知道，不存在什么“神圣的罗斯”；他相信，神圣的俄罗斯终会到来。他这个不信上帝的人正是抱着这一信念在做着上帝的事业。也正是由于他的这一信念，我们才觉得他与我们很近——比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更近。这会儿我们已不是与他们在一起，而是与高尔基在一起了。

梅列日科夫斯基认为《童年》是一部具有宗教革命（这类的搭配在当时很少有人会感到奇怪）色彩的小说，无论他说得错与对，昔日的论敌把高尔基捧得如此之高，这一点却是耐人寻味的。

要知道，当初这位梅列日科夫斯基可是把高尔基笔下的主人公们称做将来的无耻之徒的呀。可这会儿却又把他的位置摆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之前！

这一切看起来有些奇怪，索洛古勃本该赞赏《童年》中那些“阴郁的”，“令人厌恶的”内容的，因为其中描写了把烧红的顶针悄悄放到视力模糊不清的裁缝手边，几个兄弟在冬季里试图把自己的妹夫淹死在冰窟窿里，儿子们当着一家之主在餐桌旁大打出手，以及如索洛古勃所指出的，“每篇小品中都有打架和斗殴”。

其实,了解这种童年生活的恰恰就是索洛古勃,而不是勃洛克,也不是梅列日科夫斯基。

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和第一次移民浪潮中的俄罗斯文学》一书(莫斯科,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中,有一篇谢·罗·费加金评论索洛古勃的文章。

费奥多尔·库兹米奇·捷捷尔尼科夫(作家的真实姓氏)于1863年2月17日出生于彼得堡。父亲是裁缝,当过农奴,他去世时,儿子年仅四岁。母亲找到了一份仆人的工作,尽管极度贫困,但在女主人的帮助下,她还是让儿子受到了不错的教育:1882年,他毕业于圣彼得堡教师学院。不过对于这位未来的作家来说,其真正本领是在不断挨打中(着重号为本书作者所加)所获得的,挨打一直持续到他此后的生活。索洛古勃已经习惯于,甚至“依恋于”挨打,舍此他就无法活下去:生理上的疼痛成了治疗心灵创伤的药物。<……>这种在挨打中而获得的病态的快感已融入了他的世界观之中,他的整个创作涂上了一层病态的色彩。打人用的树条会时常出现在他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中。

原来如此!的确,在索洛古勃的长篇小说《卑微的魔鬼》中那些齜齜的、令人作呕的东西难道还少吗?那么为什么索洛古勃突然间就不承认高尔基有描写“令人厌恶的东西”的权利了呢?

这很容易被怀疑为创作上的嫉妒。而且,索洛古勃和高尔基的私人关系也不好,后者因前者偏爱死亡题材,便称他为“斯梅尔佳什金”^①。

但我想,原因不在于此。依据自身的经验,索洛古勃十分清楚,类似于高尔基这篇小说的作品是用“哪些垃圾”培育出来的。虽然他也明白,其中的许多描写都是“苦涩的”事实真相,但他仍旧怀疑,作家对某些场景和情景还是作了主观、刻意的描写。当他觉得《童年》歪曲了他本人的,对他而言是病态的“事实真相”时,他在阅读这篇小说的过程中就更加不自

① 斯梅尔佳什金:俄国人的姓氏,其词根在俄文中意为“死亡”。

在了。

“不是那么回事儿……”而这种“不是那么回事儿”的感觉就使得他难以发现《童年》那崇高的诗性——外祖父、外祖母和小茨冈等美妙形象所焕发出的诗性。

他为什么会感觉到“不是那么回事儿”的呢？

人们通常是从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这两个视角来看待小说《童年》。关于现实主义的视角，高尔基本人在上文所引的《童年》片段中已作了说明。这篇小说讲述了“铅一样沉重的丑事”，不幸的俄罗斯人在这样的生活中缩成一团。但小说同时又保持了这样的信念：俄罗斯民族的青春活力和聪明才智最终将会把他们的生活“引向光明”。

采用象征主义视角来观照这部小说的则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他将其视为俄罗斯象征主义的固定套式。外祖父和外祖母是俄罗斯民族处世之道和俄罗斯宗教特征的两个实体。外祖父的“宗教”是起源于彼得大帝时期的积极参与生活的国教。外祖母的“宗教”则是民间的、自发的、半多神教性的宗教。

这两种宗教都对“神圣的罗斯”加以否定，并为新的“神圣的俄罗斯”奠定了基础。倘若把外祖父那种积极参与生活的国家意愿与外祖母那种自发的包容一切的博爱相结合，那就会诞生出一个新俄罗斯。

然而，问题在于，这两个实体处于既不可分割又无法交融的、同时并存的状态。它们相互依存，却又无法催生出一个完整的新物。

外祖母指的是俄罗斯，但不是全部，因为俄罗斯有“两种灵魂”^①，用高尔基那具有预见性的话来说，或许在他说的所有的话当中，这是最有预见性的话。外祖母代表的是俄罗斯的一种灵魂，外祖父则代表另一种灵魂。外祖母是美丽的，外祖父则是丑陋的。外祖母的上帝是仁慈的（“对一切有生命的活物而言，他是可亲可爱的朋友”），而外祖父的上帝则是凶

① 梅列日科夫斯基指的是高尔基的《两种灵魂》一文，该文刊登在1915年的《年鉴》杂志上。

恶的。如果说外祖母的上帝是真正的上帝,那么外祖父的则不是上帝,而是魔鬼。

对阿廖沙·彼什科夫而言是这样,或者说几乎是这样,但对高尔基来说则不是这样,或者说不全是这样。他已经知道,不是所有的真理都在外祖母那里,外祖父那里也有自己的真理,而且也同样是永恒的,完全可靠的,绝对是俄罗斯式的。<……>

外祖母使俄罗斯变得无法计量;外祖父则对它进行计量,把它积聚起来,聚拢起来,或许会拢在一个巨大的拳头中;但要是没有拢成拳头的话,俄罗斯就会散架,就会向四处膨胀,犹如发面从桶里漫出来似的。因此可以说,假如在俄罗斯只有外祖母而没有外祖父的话,那不用佩彻涅格人^①、波洛伏齐人^②、蒙古人、德国人,自身的腐朽物便把“神圣罗斯”给活活地吞噬了。外祖母是面向东方的旧俄罗斯;外祖父是面向西方的新俄罗斯。外祖母是文盲,而外祖父则是半文盲。但假如有朝一日俄罗斯脱盲了,那要感谢的是外祖父,而不是外祖母。

阿廖沙·彼什科夫处于这些向量的交会点上,并渐渐成长为马克西姆·高尔基,而这一过程对他而言是痛苦的。外祖母给他哺育爱的种子,教他以宽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外祖父则教他学宗教常识,狠狠地鞭打他,让他养成忍受疼痛的习惯,教他不要羞于把痛苦带给别人。如果说外祖母是诗,那么外祖父则是科学。

诚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这个图式一如他所有的“辩证”模式,是有“毛病”的。但就外祖母和外祖父的“宗教”对高尔基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点而言,在很大程度上他是正确的。再者,对小说的这一看法与那些似乎是“现实主义的”论断(如彼什科夫的性格是如何在铅样沉重的俄罗斯丑陋生活的条件下造就而成的)相比要有趣得多。

然而无论是第一种(社会学的)图解,还是第二种(象征主义的)图

① 佩彻涅格人:8至12世纪伏尔加河中下游的突厥部落和萨尔马特部落联盟。

② 波洛伏齐人:11至13世纪黑海沿岸草原上的突厥游牧民族。

解,它们终归是图解。我们无法透过这些图解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阿廖沙。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呢?



3 | “没有教堂的圣歌， 没有炉香……”

阅读小说《童年》和《在人间》，虽是一桩特别辛苦的事情，但却是有兴趣的。如果不是从天真的现实主义的视角来阅读这些作品（因为一旦像索洛古勃那样从这一视角来阅读《童年》，就会惊诧于小说中充斥着无理的残暴行为），但也不受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图解的诱惑，那么你就会在突然间领悟出来，原来高尔基整个生平及其创作的“密码”就藏在这些小说中。如果抱着某种怀疑态度——虽说是充分理由的，但毕竟是怀疑主义的态度——将这些小说当做符合实际情形的作家传记来接受的话，那就会有一些惊人而奇妙的发现。在本书作者看来，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高尔基本人在写作《童年》和《在人间》时，正是抱着有充分理由的不信任态度来看待阿列克谢·彼什科夫这一人物的，而绝非总是把他与自己混为一谈。

顺便指出，这种特质（“我”的分裂）对高尔基来说一向具有典型意义。在写给未婚妻叶卡捷琳娜·沃尔任娜（后来成了他的妻子）的信中，这一点就已经有所反映。这种分裂似乎带有嘲讽的色彩：未婚夫在心爱的女人面前免不了稍作“卖弄”。然而在这份嘲讽的背后也透露出几许严肃。

高尔基在 1896 年 5 月的信中写道：

首先，彼什科夫是个不那么简单而清晰的人物，他过于相信自己不同于别人，过于炫耀这一点，其实，他究竟是否不同于别人，这还是个问题。这或许仅仅是一种强烈的愿望而已。但这种愿望就使得他对别人提出过

高的要求,并有些瞧不起他们。好像就彼什科夫一人绝顶聪明,别人都是白痴和傻子。〈……〉最主要的是,他是个不大好懂的人,因为他对自己就懵然不懂。这是个反常的、难以理解的人物。除了这些非常严重的缺点之外,还有其他许多不足,有一些我不记得了,还有一些我不得而知,另外一些我不想讲,因为我觉得很无聊,还因为我对彼什科夫怀有怜悯之心——我喜欢他。只有我真正喜欢他。关于这位先生的优点我就不说了,你恐怕比我更清楚。不过,总的说——我要警告你,非常严肃地警告你,卡佳^①,——总的说,这个人有很多怪毛病。有时我倒是乐于想,他有自己的聪明之处,但我常想的却是,他也傻得离奇。最主要的是,他实在是难以理解的,这就是他的不幸。

写这封信的已是“马·高尔基”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已经是一位知名作家了,因为俄罗斯文学政论期刊中最受欢迎的“厚”杂志《俄罗斯财富》在1895年发表了短篇小说《切尔卡什》。

读者只要仔细阅读上述两部中篇小说,便会获得双重印象。作者好像连他自己都对面前的正在成长的这一人物感到诧异,抱着某种不信任的态度在研究他,并在为自己得到某种结论,而这些结论他没有明说,只是对读者有所暗示。

他似乎在说:“鬼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男孩?可我觉得……”

接下来,我们就陷入了符号、象征和暗示的密林之中。

受过洗的阿列克谢·彼什科夫头一回去教堂做忏悔时,已是个少年了,当时他在外祖母的一个亲戚家做用人。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呢?据《阿·马·高尔基生平和创作年谱》记载,他大约是在1880年9月来到瓦·谢尔盖耶夫家里的,1881年5月又从他家里逃了出来。那么,一个受过洗的、十二至十三岁的少年对忏悔是怎么回事、对怎样举行圣餐仪式竟然会一无所知?

① 卡佳:叶卡捷琳娜的小名。

我喜欢去教堂；我爱站在某个宽敞一点，暗淡一些的墙角，从远处看着圣像壁——它好像融化在烛光里了。像一条条浓浓的金黄色小溪流向读经台的灰色石头地板；圣像画上的深色形体在轻轻地蠕动着；圣像壁中门的像花边似的金色图案欢快地摇曳着，烛光仿佛金黄色的蜜蜂飘悬在淡蓝色的空中，而妇女和姑娘们的头犹如花朵一般。

当他被送到多里梅东特神甫那里做忏悔时，他紧张得要命。离开神甫时，他——

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他本来由于对忏悔的恐惧而感到紧张，可实际上并不那么可怕，甚至也不那么显得有趣……

第二天，当阿列克谢带着十五戈比（用于捐献）去领圣餐时，他错过了圣餐仪式，不仅如此，还把钱拿去“打拐子”^①给输掉了。阿廖沙唯恐回到谢尔盖耶夫家里后骗局被揭穿，便问——

一身节日打扮的青年人：

“您领过圣餐了吗？”

“是的，怎么啦？”他疑惑地打量着我问道。

我请求他告诉我，人们是怎么领圣餐的，神甫在这个时候说些什么，我该做些什么。

难道在信奉东正教的卡希林家庭里就没人知道同样也是信奉东正教的近亲家庭^②所知道的那些东西？

高尔基在写给格鲁兹杰夫的一封信中坦言，他总是很容易把日期以及事件搞混，但却具有非凡的记人本领。这就是说，即便高尔基回忆起了

① “打拐子”：一种游戏，把一块蹄腕骨砸向远处的一些蹄腕骨，砸中者为胜。

② 瓦·谢尔盖耶夫的母亲和阿·彼什科夫的外祖母是姊妹关系。